

思想政治工作刍议

何天齐

(一) 人与其他动物的一个根本区别就是人有思想。当然,其他动物,特别是某些高等动物,也有一些初步的分析、综合、归纳、演绎的能力,即除了感觉以外,也有一些初步的思想活动,用康德和黑格尔的说法,叫做悟性活动或知性活动,但不是理性活动。理性活动,即运用概念的思维活动,则仅为人类所特有。

有人说,人与其他动物的根本区别不是思想,而是生产劳动。这有一定道理。因为劳动是使人类最终从动物界分化出来的根本标志,是使人类社会从自然界独立出来的基础,劳动创造了人本身;没有生产劳动,就没有人类,更谈不到有人类社会。劳动对于人和人类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具有根本的决定意义,它是人的生命存在和全部社会生活的基础和源泉。但是,人的劳动离不开思想。人类的劳动同动物适应环境的无意识的本能活动不同,它是人类运用自己制造的工具所进行的一种有意识、有目的、有计划地改造自然的的活动,也就是说,是在一定的思想指导下的活动。马克思说,人比蜜蜂不同的地方,就是人在建筑房屋之前早在思想中有了房屋的图样。^①人类的思想意识以及语言都是在劳动中或者说与劳动同时产生和发展的。因此,说人与动物的一个根本区别是人思想,同说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在于生产劳动,二者并不矛盾,是完全一致的。也许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的手稿中,在讲到“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之后,删掉了一句话,这句话的原文是:“这些个人使自己和其他动物区别开来的第一个历史行动并不是在于他们有思想,而是在于他们开始生产自己所必需的生活资料”。^②这就告诉我们,人类的生产活动和思想意识是不可分割的,都是人区别于其他动物的根本标志。富兰克林给人下的定义是“制造工具的动物”,黑格尔则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在于他能思维”。这都是很有道理的。

马克思曾经把人类的思想称为“世界上最丰富的东西”,恩格斯则誉之为“地球上的最美的花朵”。^③现在,这枝花朵已发展成为一个五彩缤纷、灿烂夺目的精神世界。

(二) 西方有一种议论,说马克思主义只重视经济,不重视思想。这是歪曲,至少也是一种误解。不错,马克思主义确实重视经济,认为人类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是全部社会生活的基础,社会的经济条件归根到底决定着历史的发展。这是科学的历史观即唯物史观的基本观点。恩格斯在评价马克思一生的科学功绩时说:“正象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因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为基础,人们的国家制度、法的观点、艺术以至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象过去那样做得相反”。^④马克思的这个发现,是历史观上一个伟大的革命,从此,人类对社会历史的认识才变成了科学。但是,唯物史观不是“经济唯物主义”,也不是形而上学的历史观,它从来也没有说经济因素是社会发展中唯一决定性的因

素。相反，它认为经济状况虽然是基础，“但是对历史斗争的进程发生影响并且在许多情况下主要是决定着这一斗争的形式的，还有上层建筑的各种因素”。^⑤整个社会的发展过程，是在各种因素和力量的交互作用中进行的，这些因素和力量在不同的时间、地点与条件下占有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是不同的。说经济因素起决定作用，是在最终的和根本的意义上来讲的，即从总体和归根结蒂的意义上来说，经济因素起着决定的作用，至于对某个具体的历史时期或历史事件的分析，那就不能这样简单地去硬套了。恩格斯晚年针对当时已经出现的把唯物史观简单化、庸俗化的倾向曾经多次告诫说：“青年们有时过分看重经济方面，这有一部分是马克思和我应当负责的。我们在反驳我们的论敌时，常常不得不强调被他们否认的主要原则，并且不是始终都有时间、地点和机会来给其他参预交互作用的因素以应有的重视”。^⑥他还说，这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一种“疏忽”和“过错”。^⑦后来的历史事实证明，恩格斯的这个说明和告诫具有多么重大和深远的意义！许多社会主义者对恩格斯的这个告诫不重视，结果自觉不自觉地犯了只重视经济、而忽视政治和思想的严重错误，贻误了革命时机，造成了严重后果。只有列宁和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真正重视和领会了恩格斯这个告诫和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真义，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和敢于反潮流的气概，运用革命辩证法，在一个经济比较落后的大国取得了世界上社会主义革命的第一个伟大胜利。

（三）综观列宁的革命活动和他的著作，我们可以看到，他领导俄国革命成功，除了一定的客观条件与革命形势以外，主要靠思想和组织这两件东西，而思想又是领先的。大家都知道列宁有句名言：“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⑧这句话不是列宁的发明，而是普列汉诺夫在1883年所写的《社会主义与政治斗争》一书中首先提出的。^⑨那时普列汉诺夫是俄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这个话是针对当时资产阶级学者非难唯物史观、硬说马克思主义否定思想和政治因素在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作用而发的。列宁完全同意普列汉诺夫的观点，并且在将近二十年之后，在《怎么办》这部为布尔什维克党奠定思想理论基础的巨著中几乎一字不差地重申了这种观点，驳斥和批判了俄国经济派（还有第二国际）崇拜工人运动的自发性、忽视革命的思想理论的作用的错误观点。也是在这部著作中，列宁又在组织问题上批判了经济派的手工业方式和崇拜组织工作中的自发性的错误，并且把笛卡尔的一句名言（“给我以物质和运动，我将构造出一个宇宙”）改成“给我们一个革命家组织，我们就能把俄国翻转过来”。^⑩尔后，在《进一步，退两步》这部奠定布尔什维克党的组织基础的著作中，列宁又批判了孟什维克在组织问题上的机会主义观点，指出：“无产阶级在争取政权的斗争中，除了组织而外，没有别的武器”；“无产阶级所以能够成为而且必然会成为不可战胜的力量，就是因为它根据马克思主义原则形成的思想统一是用组织的物质统一来巩固的”。^⑪由此可见，一个思想，一个组织，这是无产阶级革命的两个主要武器，是克敌制胜的主要法宝。只有思想理论正确，才会有正确的纲领、路线和政策，才能调动千军万马；只有组织坚强有力，才能把千百万劳动者团结成革命大军，形成实现正确思想和正确路线的物质力量。

虽然列宁从事革命时的俄国，资本主义已有很大发展，形成了社会化大生产和相当数量的比较集中的无产阶级队伍（到19世纪末，俄国无产阶级已超过两千万人），但是同当时的欧洲和美国比较起来，俄国还是落后的。按照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社会主义革命将首先在比较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胜利的理论，俄国是不具备这种条件的。第二国际修正主义者、俄国经济派和孟什维克正是抓住这一点，反对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反对一国实现社会主义。他们的口头禅是：“俄国生产力还没有发展到足以实现社会主义的水平”；“俄国还没有实现社会主义的客观的经济前提”。^⑫这场争论的实质，从理论上来说，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

理解成形而上学的“经济唯物主义”，还是辩证法的唯物史观的问题。这场争论可以说从恩格斯逝世就开始了，而在俄国革命中突出表现出来，并且一直持续到十月革命以后很长一段时间，以致列宁在逝世前一年的重病之中还不得不专门口授了《论我国革命》这样的著名论文，批驳第二国际和孟什维克的观点，再一次为俄国社会主义革命作了理论上的论证。列宁揭露了这些人在理论上的“迂腐”和“学究气”，指出他们对“马克思主义中有决定意义的东西，即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辩证法”“一窍不通”。^⑩他们的“最大错误和最大罪恶”，就是不懂得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这个真理，“不善于在无产阶级革命最紧要的关头运用这一点”。^⑪历史实践证明，那些停留在马克思主义书本上咬文嚼字的人，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有象列宁那样，真正领会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能够从实际出发，对具体问题进行具体分析，敢于也善于改变以往理论中不适应新情况的部分，从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人，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试想，如果拘泥于马克思主义的字句，如果停留在马克思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只能在生产力比较发达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同时胜利的旧结论，那末，就不会有十月革命和以后一系列无产阶级革命的胜利，也就根本不存在今天的社会主义世界！

（四）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大国，经济、文化比俄国更加落后，如果按照对马克思主义的学究式的迂腐理解，根本就不能进行无产阶级领导的任何革命，更不用说实现社会主义了。但是，以毛泽东为领袖的中国共产党，不但赢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而且胜利地进行了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中国革命胜利的原因很多，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高度重视思想的作用，重视思想政治工作。可以说，我们党就是靠思想和思想政治工作起家的。同俄国共产党相比，我们党更加着重于思想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始终把思想建设放在党的建设的首位，创造了一整套思想政治工作的经验，并且形成了一种高度重视思想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

大家都知道，毛泽东同志历来强调思想的极端重要性。早在井冈山斗争时期，他就指出：“无产阶级思想领导的问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边界各县的党，几乎完全是农民成份的党，若不给以无产阶级的思想领导，其趋向是会要错误的”。^⑫为党与军队的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奠定基础的古田会议决议，其中心内容就是要“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从各个方面、用各种办法有效地解决人们的思想问题。《实践论》和《矛盾论》则是在更高的层次上、即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解决思想问题，统一人们的思想认识。1941年9月，毛泽东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一次讲话中指出：要以思想、政治、政策、军事、组织五项为“政治局的根本业务”，而掌握思想教育是“第一等的业务”。在当时那种政治和军事斗争异常复杂和尖锐的年代，毛泽东把思想教育列在党的工作的首位，这是发人深思的。接着开始的延安整风运动，就是一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思想教育运动。正是这次思想解放运动，保证了中国革命的胜利。用整风运动的形式解决人们的思想问题，大幅度地提高全党的思想政治水平，这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创举。尔后，1944年，由毛泽东主持、周恩来参与写成的《留守兵团政治部在西北局高干会议上的政治工作报告》，这是继古田会议决议之后又一个极其重要的关于党和军队建设的历史文献，其中指出：“干部思想的进步是一切工作进步的枢纽，只有在干部思想有了进步之后，工作的进步才是真正可靠的进步”；“在一定物质基础之上，思想掌握一切，思想改变一切”。这个报告还指出：“干部中群众中蕴藏的正气，热忱，创造性，积极性，一经被启发，就会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源泉，就会变成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而要启发干部和群众中的这种创造性、积极性，就要靠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1945年，毛泽东在“七大”的政治报告《论联合政府》中又一次强调指出：“掌握思想教育，是团结全党进行伟大

政治斗争的中心环节。如果这个任务不解决，党的一切政治任务是不能完成的。”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对我党领导中国革命几十年的历史经验的一个概括和总结。

历史已经证明，在经济落后的中国，我党这种高度重视思想的作用、重视思想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的观点和传统是非常正确和珍贵的，它保证了我们各项工作的成功和革命事业的胜利。但是，正如列宁所说，任何正确的东西，“只要再多走一小步，仿佛是向同一方向迈的一小步，真理便会变成错误”。^⑩建国以后，特别是从五十年代后期开始，毛泽东同志就犯了这种片面夸大思想、政治的作用，夸大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反作用的错误。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不是阶级矛盾，他仍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忽视了发展社会生产力和改善人民的生活，以致在长达二十年之久的时间内，我国的生产力没有多大发展，人民的收入增加很少，生活水平很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毛泽东同志的这种错误，并且把它推向极端，大搞唯意志论和精神万能论，破坏了各方面的工作，败坏了思想政治工作的声誉，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集中力量发展社会生产力。这是最根本的拨乱反正，是我们制定政策和考虑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因为只有这样，才能摆脱贫困的社会主义，才能逐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需要和文化需要，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中国所面临的许多重大问题，也才能真正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但这并不是说可以忽视和放松思想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恰恰相反，我党关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关于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的方针、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战略地位、关于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两个基本点及其相互关系等一系列问题的论述告诉我们，在新的历史转折时期，思想政治工作不但不应该削弱，而且应当加强，应当在继承和发扬优良传统的基础上不断加以改进和发展。

（五）根据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总体布局，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忘记，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心是经济建设，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为了发展生产力，必须对经济体制、政治体制等进行改革，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必须有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环境。为此就必须坚持党的领导，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这样，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党提出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路线，就包含着两个互相联系、相辅相成的基本点：一个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一个是坚持改革、开放、搞活的总方针和总政策。这两个基本点是唇齿相依、相互渗透的统一整体。不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就会遭到破坏，改革和开放就会失去根本的政治保证，甚至会走到斜路上去；不实行改革和开放，社会主义就会停滞和僵化，就不可能充分发展社会生产力，也就不能在实践中真正有效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因此，两个基本点缺一不可，无论缺了哪一个，都谈不上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没有希望。如同过去思想政治工作要服务于党的总路线一样，新时期的思想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也要围绕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进行，要全面地准确地坚持不懈地宣传和贯彻这条路线，保证它的胜利实现。

四项基本原则是我国的立国、治国之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是写进了党章和宪法的，是属于党纪国法的范畴，它对每个党员和公民都有约束力，但同时又是属于思想政治教育的范畴，是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内容。我们宣传四项基本原则，不能用僵化的观点即不能用过去在“左”的思想指导下长期形成的某些框框来套社会主义的现实，否则，就会得出否定改革、开放、搞活的结论，就会破坏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两个基本点的有机统一。要知道，

过去长期形成的某些观点，有的本来就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原意，有的则由于条件的变化已经不适用或者不完全适用了，我们不能停留在几十年乃至一百多年以前的个别原理和个别结论上。比如，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三中全会以来就有了很大的提高和飞跃。实行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认识到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这是一次大的提高和飞跃；以后确定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的方针，是又一次大的提高；十二届三中全会和六中全会相继确定了全面经济体制改革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指导方针，是再一次大的提高；当前对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的两个基本点及其相互关系的理解和阐述，以及十三大将要解决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方针等问题，都是对社会主义的认识的深化和提高。所有这些，都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科学社会主义的丰富和发展。如果我们进行社会主义教育和思想政治工作不考虑这些重大的发展，那就是脱离现实生活，就没有说服力，就会在实际上阻碍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贯彻。其他如党的领导、人民民主专政、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也是如此。需要强调指出的是，我们反对用僵化的观点理解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容许借口反对僵化实际上反对四项基本原则，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无论是僵化，还是资产阶级自由化，都是阻碍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贯彻执行的。不断地克服和排除这两方面的干扰和影响，提高全党和全国人民在这方面的自觉性和识别能力，是新时期思想政治工作的一项长期的和根本的任务。

坚持改革、开放、搞活的总方针和总政策，是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另一个基本点，是这条路线的新内容、新贡献。没有改革、开放、搞活，就没有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也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如同不能用僵化的观点看待四项基本原则那样，也不能用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观点来看待改革、开放、搞活，否则就会滑向“全盘西化”，得出否定四项基本原则的结论，同样也会破坏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两个基本点的有机统一。要看到，当前我国正处在艰苦奋斗，奋发图强，克服贫穷落后，建设具有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繁荣富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关键时期，我们正在进行的各项改革和现代化建设，是要从经济、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根本改变中国面貌的前无古人的伟大而艰巨的事业，我们的改革是得到亿万群众拥护的，这是改革必定成功的根本保证。但是也要清醒地看到，对于这样一场巨大的变革，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准备、理论准备还是不足的。这一点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尽快地补上这一课。否则，改革将遇到极大的阻力，甚至有停滞或半途而废的危险。就苏联而言，进行各种程度不同的改革断断续续三十多年，现在进展仍很不容易，新与旧的斗争仍很尖锐，戈尔巴乔夫认为，主要阻力是“思维上的障碍”。^①这是很有见地的。再看我们的近现代史。“五四”以前的经济、政治变革为什么没有取得成功或彻底成功？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因为缺少了一场思想革命。有了“五四”这场思想解放运动，以后的情况就大不一样了。但是，五四运动虽然反掉了老八股、老教条，为马列主义传入中国打开了道路，但以后又产生了洋八股、洋教条，这就是我们党内以王明为代表的教条主义。这种教条主义在人们的头脑中一度弄得根深蒂固，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是延安整风这场继五四运动之后的又一次思想解放运动，彻底清除了王明的教条主义，才从根本上保证了中国革命的胜利。现在，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开始，伴随着现代化建设和全面改革，也正在进行着一场新的思想解放运动。这场思想运动，既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又要克服僵化的观点，为改革、开放、搞活鸣锣开道。一句话，就是要为全面地正确地贯彻执行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扫清道路，提供思想政治保证。历史经验告诉我们，这场思想解放运动的成败，将决定改革的命运和中国的前途。因此，在这样一个重大的历史转折时期，任何稍微轻视思想理论的作用和思想政治工作的观点和做法，都是错误的和危险的。

三中全会以来路线的宣传和教育，要同共产主义思想的教育、理想纪律教育、法制教育、爱国主义教育 and 革命传统教育等结合起来，综合进行。所有这些宣传和教育工作，都要密切联系实际，从群众的切身体验出发，有的放矢地解决群众的思想认识问题。思想教育既要做到生动活泼，形式多样，又要有一定的理论深度，富有新意。为此，就要学习和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并运用这些原理研究现实生活中提出的一些重大理论问题。只有理论上搞清楚了，我们才能说服群众，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群众的思想问题。我们知道，人们的精神世界是一个多层次的系统，世界观、人生观、方法论处于最高层次，只有在这些问题上深下工夫，从这些根本问题上解决人们的思想认识问题，才是长远起作用的因素。人们的理想、信念、道德、情操、意志、情感，只有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才是科学的革命的健康的，才真正具有现代性的意义。如果忽略这些根本性问题，只在形式上作文章，搞花架子；尽管一时搞得花花俏俏、热热闹闹，但从长远和本质上看，是不能根本解决问题的。

(六) 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除了继承优良传统、总结现实经验以外，也要学习和借鉴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某些科学成就和技术。比如行为科学，虽然产生于资本主义的土壤，但由于它运用了心理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的理论与方法研究社会集团中人的行为及其相互关系的规律性，又包含着一系列的科学研究，如对人的心理规律的研究，对人的需要、动机和激励机制的研究，对企业中非正式组织以及人与人的关系问题的研究等等，这些对我们都有借鉴意义。他们的这些东西有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搞得比较细，有长期的实验作基础。比如行为科学本身，就是在1924年到1932年长达八年之久的有名的霍桑实验的基础上产生的。这次实验的结果证明：工厂的生产效率与诸如车间的照明、休息时间、工间茶点之类的条件关系不大，甚至与工资、奖金的关系也不是很大。影响人的工作的因素，还有比金钱更重要的东西，那就是社会关系和心理因素。工人的“士气”，对工厂的感情，与同事的关系，上下级的沟通等，都比金钱重要。据此，美国哈佛大学心理学教授埃尔顿·梅奥在1933年发表了他的“人际关系”学说，批判了古典管理学派把人看成“经济人”的理论，提出了人是“社会人”的观点。从此之后，西方管理的重点，从物转向了人，许多企业都注重从社会学、心理学的角度来解决调动人的积极性的问题。这样，就出现了管理心理学这门学科。1949年在芝加哥大学召开的一次跨学科的讨论会上，正式把这门综合性的学科定名为“行为科学”。从此，在西方现代企业管理中就形成了很有影响的行为科学学派。继霍桑实验之后，管理心理学家马洛又在哈罗德公司进行了一个有名的实验。这个公司要实行一次改革，牵涉到部分工人的工作性质与工作方法，实验的设计是要测定工人参与改革方案讨论和不参与这种讨论的效果。为此，把工人分为参与组和非参与组两个组。实验结果是：非参与组改革后产量下降35%，一个月后有9%的工人离职另找工作，其他人都抱怨工资低，六星期后亦无好转；而参与组的情况却大不一样，改革后的第二天产量就恢复到以前水平，三星期后产量比改革前提高了14%，没有人离职，也没有人发牢骚。同一个改革方案，采取不同的方法实施，得到了不同的结果，这是很值得深思的。

无论霍桑实验，还是马洛实验，看起来很有点象学的社会主义的东西。据说，鉴于列宁领导的十月革命动员群众的广度和深度震惊了资本主义世界，使得资本主义的一些有识之士也注意学习和研究苏联这方面的经验。霍桑实验和马洛实验都把主要注意力放在对人的考察，对人的精神世界的研究和调动人的积极性上，大概与此不无关系。除了重视思想的作用、重视激发人的工作动机的方法和手段的研究以外，资本主义学习社会主义的东西还不少。比如计划经济，某些资本主义国家(如法国)在三十年代的严重经济危机、特别是二次大战以后纷

纷采用，资产阶级经济学家也承认“这种计划在很大程度上起源于社会主义理论”。^⑧又如，用生产力的发展、物质的经济的发展说明社会的发展，预测社会的未来，如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到来》和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等著作所做的那样，这同过去把思想动机、精神力量看作是决定社会发展的唯一因素的历史唯心主义不同，不管作者承认不承认，实际上是受到了唯物史观的某种影响，等等。既然资本主义可以学习社会主义的东西，那末社会主义吸收一些资本主义的合乎科学的东西也是理所当然的。需要指出的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毕竟是两种根本不同的思想体系和社会制度，资本主义是不可能学到社会主义的本质东西的。即如计划经济，由于资本主义实行的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各个重要的经济部门和产业基本上把持在私人资本家或资本家集团手里，要在全社会范围内实行计划经济是根本不可能的。《后工业社会的到来》等著作，虽然是从生产力、特别是从科学技术的角度来说明人类社会的发展，能够解释一些问题，值得我们重视，但是它们撇开生产关系，抹杀两大阶级、两种制度的矛盾和本质区别，从根本上说是一种“技术决定论”的错误理论。至于霍桑实验、马洛实验、“人际关系”学说、行为科学这些东西，虽然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的地方不少（特别是它的方法和技巧），但是也要看到，它们根本上是为维护资本主义制度、为更巧妙地剥削压迫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服务的，它们绝对不可能象社会主义制度的本性所固有的那样，做到人民当家作主，劳动者管理国家和企事业单位，人与人之间真正的民主和平等，干部是人民的勤务员和社会的公仆，“领导就是服务”，等等，也不可能在调查分析人们的思想、心理情况时作到真正的实事求是。因此，我们学习和借鉴西方的这些东西时必须坚持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我们的优良传统，否则就丢掉了我们的优势和特色，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就不能坚持正确的方向，改革和创新也就会失去基础。还要看到，西方的社会科学（包括管理科学、行为科学在内），由于偏重于数量分析，往往变成一套越来越复杂的技巧和方程式，既脱离广大群众，也不见得就能认识客观世界的全貌和本质。实际上，生活中有许多东西是不可能量化和程式化的，不可能做到那么“精确”的，人们的精神世界和思想政治工作尤其如此。所以，我们在学习时，一方面要重视数量分析，以克服我们长期存在的胸中无数、大而化之的缺点，另一方面也不能迷信量化，不能迷信西方“将一切学问都技术化”的思想，否则就可能陷入一种新的高级形而上学。总之，以我为主，博采众长，融合提炼，自成一家，这就是我们学习西方科学文化所应当采取的态度和方针。

注释：

①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202页。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页。

③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62、574页。

⑤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77、479页。

⑦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0、502页。

⑧⑩⑪ 《列宁选集》第1卷，第241、337、510页。

⑨ 参见《普列汉诺夫哲学著作选集》第1卷，第98页。

⑫⑬⑭⑮ 参见《列宁选集》第4卷，第691、690、689、226、257页。

⑯ 《毛泽东选集》横排版，第76页。

⑰ 参见1986年11月15日《人民日报》。

⑱ 参见(美)阿兰·G·格鲁奇著《比较经济制度》中的“法国的计划经济”一章，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5年版。